

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本文对当代伊朗外交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回顾。本文认为,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外交是片面追随美国的依附外交, 同时也构成了伊斯兰革命的根源之一; 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革命外交”导致伊朗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 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 伊朗的“缓和”与“对话”外交, 使国际环境得到相对改善; 内贾德政府执政后, “拥核崛起”成为伊朗国际战略的核心, 导致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再度紧张。当代伊朗外交有两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吸取的历史教训。首先, 如何避免外交走向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 其次, 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关键词: 伊朗外交; 巴列维王朝; 霍梅尼; 拉夫桑贾尼; 哈塔米; 内贾德

中图分类号: D3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1)01-0008-07

在现代国际社会, 任何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实现程度, 都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制约, 并取决于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伊朗的地缘安全环境十分复杂, 如何处理与世界大国以及周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为重要。就历史与现实来看,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 伊朗一方面以追求民族复兴与强大为目标, 但另一方面又推行片面追随美国的依附外交, 进而埋下了伊斯兰革命的根源。在伊斯兰革命后, 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推行反西方外交与“输出革命”外交导致伊朗陷入空前的孤立; 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 伊朗曾一度采取“缓和”与“对话”外交, 国际环境得到相对改善; 内贾德政府执政后, 伊朗再度走向保守, 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与西方发生尖锐对抗, 并导致国际社会的制裁不断加重, 使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再度处于日趋紧张的状态。

一、巴列维王朝的“第三国外交”与依附外交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 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尤其是英国和沙俄在西亚、中亚的争夺, 具有丰富资源和重要地缘政治位置的伊朗成为英国和沙俄的势力范围, 英国的势力范围在南部和中部, 而沙俄控制了伊朗的北部, 其他地区则沦为两国争夺的缓冲地带。^{[1][13]} 面对这种严酷的民族危机, 伊朗恺加王朝(1797~1924年)奉行所谓的“第三国外交”(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 即在伊朗面临英俄两个强国威胁时, 寻找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与伊朗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第三强国, 以抗衡和制约英俄的殖民统治。19世纪初, 恺加王朝曾尝试投靠法国制衡英俄。1807年法伊两国缔结《法伊芬肯斯坦因条约》, 法国同意军事保护伊朗。然而, 法国却背信弃义, 暗地勾结英俄, 出卖伊朗, 导致伊朗第三国外交失败。

收稿日期: 2010-07-05

作者简介: 刘中民(1968-), 男, 河北迁西县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外交。

^{*} 本文系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08JJDGJW256)、2008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研究”(08ZS35)、2008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得到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上海市“曙光计划”、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

20世纪初,伊朗恺加王朝又尝试引进美国势力,以遏止英俄扩张,但因俄国坚决反对而未果。^{[2]74}

在此背景下,伊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并爆发了1905~1911年的宪政革命。1921年,礼萨·汗发动政变,并于1925年加冕为国王,史称巴列维王朝(巴列维为古代波斯一个强盛王朝的名字,礼萨·汗借此预示实现伊朗复兴的理想)。不容否认,实现伊朗民族复兴、独立与强大,是礼萨·汗的重要政治追求,并在伊朗外交中得以体现:废除领事裁判权、解除外籍雇员在国家政府部门的职务、实行关税自主、拒绝偿还不合理的国际债务、收回恺加王朝给予外国的租让权、驱逐外国驻军和军事基地等政策的施行^{[3]13},都显示了礼萨·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的努力。

但是,当以上措施因威胁英、苏等国既得利益并由此引发外交危机时,礼萨·汗并没有吸取历史上“第三国外交”失败的历史教训,再度将“第三国外交”作为伊朗外交的重要选择。从1922年起,礼萨·汗试图通过赋予美国广泛的财政权和石油开采权制衡英苏,但由于美伊双方的巨大分歧,以及英苏从中作梗和排挤,加上当时美国实力不够强大,伊朗“第三国外交”再次遭到失败。此后,礼萨·汗又引进德国以抗衡英苏。1927年,礼萨·汗改聘德国人担任伊朗财政顾问和中央银行行长,随后邀请大量德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和技术人员进驻伊朗,德国在伊朗势力急剧膨胀,并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军队。1939年二战爆发后,礼萨·汗对外宣称严守“中立”政策,但实际上仍旧执行亲德政策,拒绝盟军通过伊朗向苏联抗德前线运送战略物质,遭到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强烈反对。1941年8月,英苏以抗击德国入侵、确保援苏运输线畅通为由,联合出兵占领伊朗,将德国势力从伊朗彻底清除。9月,礼萨·汗被迫宣布退位,流亡南非,让位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1943年9月,伊朗被迫对德宣战,宣告了“第三国外交”的彻底失败。^{[2]76}

由此可知,“第三国外交”在本质上是一种依附外交,伊朗推行依靠法、美的“第三国外交”失败后错误追随德国,导致国家和民族独立丧失的事实表明,依靠“第三国外交”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伊朗随时都有被“第三国”出卖的威胁。礼萨·汗奉行“第三国外交”,不仅直接导致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过于迷信“均势外交”,企图渔利于列强争斗,尤其是错误地将伊朗绑在德国的战车上,从而最终导致自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同时由于英苏势力大举进入伊朗,以及随后伊朗受制于美国的局面出现,伊朗的发展根本无法摆脱外部势力的束缚与羁绊。这种局面也构成了礼萨·汗之子小巴列维在继承王位后,采取亲美政策,遭致伊朗人民强烈反对的历史根源之一。

1953年,小巴列维勾结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摩萨台政权,使伊朗更加依赖美国的庇护,美国则依靠伊朗国王谋取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双方结成了反对民主进步力量的同盟。此后,在美国政府的撮合下,伊朗与西方国际石油资本进行谈判,美国石油资本成为最大的赢家,伊朗因此获得美国45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4]64},伊朗则以加入《巴格达条约》回报美国。1959年美伊签订军事协定,使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朗的控制。

此外,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影响成为伊朗进行白色革命的重要外部因素。1961年,肯尼迪在援外咨文中说:“每个将得到我们援助的国家都应该认真承担义务,作出尽可能的努力去动员自己的资源,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内部改革。这些改革应包括:土地改革,税收改革,改进教育制度,保证社会公平。”^{[5]28}美国要求巴列维王朝任用温和分子,放松政治压制,进行土地改革,以此消弭革命,稳住政权。美国的压力构成了巴列维进行改革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1961年5月,巴列维国王接受肯尼迪的推荐,任命前伊朗驻美国大使阿米尼为首相,在他的内阁中有三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改革家,即教育大臣德拉赫欣什、司法大臣阿拉木提和农业大臣阿尔桑贾尼。^{[6]31}美国对伊朗白色革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白色革命期间,美伊贸易迅速发展。1975年美国同伊朗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石油贸易协定,总金额高达150亿美元;^{[7]36}从1975年开始,伊朗成为美国在全球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也是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6]38}为了使伊朗听命于美国,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1946~1953年,美对伊经援和军援总额为1.184亿美元;1953~1965年,美对伊经援为7.954亿美元,军援为7.029亿美元;1965~1971年,美国对伊经济援助为3.491亿美元,军援为8.041亿美元,共计11.532亿美元,到1979年,美国对伊军援达74.2亿美元。1970~1977年,美对伊军火销售总值为

163 13亿美元。^{[8]268 273 292}美对伊经济和军事援助不断增加的战略目的在于控制波斯湾的战略通道和石油资源,利用伊朗的领土建筑防止苏联南下扩张的桥头堡,以确保自己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6]41}

随着美国与伊朗军事合作关系的加强,美国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朗。其中 1976~1977年度有 40 多家美国公司为伊朗提供军备,并雇用了 2 728 名美国专家在伊朗工作。此外,估计有 3 200 名美军退休人员在伊朗的美国公司服务。受此影响,在伊朗的美国公民不断增加,其中 1972、1975、1976、1981 年分别为 1.5 万、1.67 万、3.1 万和 3.4 万。^{[8]295-296}美国驻伊朗专家在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同时,也带来了与伊朗本土伊斯兰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这一切都遭到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界人士的猛烈攻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实践也证明,其主攻目标是对内推翻国王政权,对外反对美国对伊朗的控制。因此,有学者分析指出,美国在伊朗的全面渗透和扩张是引发伊斯兰革命的外因:第一,美国把伊朗作为自己在海外的战略能源基地加以掠夺和占领,并从伊朗获取丰厚的石油美元和军火利润,引起了伊朗民众的强烈不满;第二,伊朗人民对美国策划政变推翻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的摩萨台政府、把伊朗当成遏制苏联的“桥头堡”等玩弄伊朗于股掌之中的霸权行为积怨甚深;第三,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美国式”的“现代化”,使长期积累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6]41}

二、霍梅尼—哈梅内伊时期的“革命外交”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革命不仅要在伊朗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而且要在全世界寻求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他认为目前的世界体系是失去了公正而充满了邪恶的世界体系。要改变现行世界体系,最佳的办法是首先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政府,再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最终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霍梅尼还提出了“七个反对”的思想,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西方化、世俗化、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9]341}

1980 年,霍梅尼进一步提出革命的输出问题。他指出革命不应仅限于伊朗,“应该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10]855}。在这种伊斯兰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伊朗外交呈现出鲜明的革命与激进特征。

1 以反美为主的反西方外交。霍梅尼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美国是剥夺与压迫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他强烈谴责美国对礼萨·汗国王的支持和控制,抨击美国从伊朗运走石油,并在伊朗建立军事基地;他把反对美国视为所有穆斯林与所有不信教者之间的斗争。1979 年他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帮助伊朗抗击美国,告诫所有穆斯林对抗美国不仅是伊朗的使命,也是所有穆斯林的使命。^{[6]61-62}因此,伊朗应该割断与美国的关系,肃清美国对伊朗的一切影响。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立即与美国断交。1979 年 11 月发生的伊朗学生扣留美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人质事件,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1980 年卡特总统派营救队突袭伊朗遭到失败,令美国颜面扫地。人质危机事件尽管 1981 年得以解决,但双方的对抗关系毫无改变。伊朗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轰炸黎巴嫩等行径予以了强烈谴责,抗议美国军舰到波斯湾地区活动,并抵制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1984 年,美国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阻止向伊朗供应武器。两伊战争期间,由于美国支持伊拉克,伊朗与美国之间一再发生摩擦甚至冲突。1987~1988 年,伊朗多次用鱼雷和导弹袭击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美国军舰,美国则于 1988 年 7 月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伊朗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与法国的关系多次发生摩擦,最终导致两国于 1987 年断交。1989 年英国作家拉什迪发表《撒旦诗篇》,伊朗以亵渎真主、侮辱先知和《古兰经》为由,判处拉什迪死刑,同时悬赏 200 万美元追杀拉什迪。此后,英国与伊朗断交。

2 以反苏为主的反东方外交。霍梅尼对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同样持反对态度。他甚至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奉劝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而皈依伊斯兰教。^{[11]130-131}1980 年霍梅尼发表新年谈话时指出,“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美国”^{[9]377}。在现实政策上,伊朗宣布取消通往苏联的第二条天然气干线,减少伊朗对苏天然气出口;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伊朗对苏联予以了强烈谴责;伊朗还指责苏联向伊拉克提供武器,默许以色列入侵黎巴嫩。1983 年,伊朗以“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了伊朗人民党总书记基亚努里等领导成员。1984 年后,伊苏关系才有所改善。总之,霍梅尼时期,伊苏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是伊苏关系虽多有摩擦,但没有走向完全对抗;二是两国在外交上互相敌对,但仍保持了一定规模的经贸往来;三是伊朗既反美也反苏,在实际操作中反西方反美甚于反东方反苏。^{[9]378}

3 “输出革命”的地区外交。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对象首先是海湾邻国。其方式主要包括：(1)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大力支持海湾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为实现这一目标，伊朗于1981年成立了“伊斯兰革命总会”，下辖五个以中东国家为主、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分支机构，即“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非洲和马格里布伊斯兰革命协会”和“亚洲伊斯兰革命协会”。^{[9]380-381} (2)大力宣传伊斯兰革命。通过组织和宣传，霍梅尼关于伊斯兰革命思想的传单和录像带大量地输送到海湾国家，伊朗的阿拉伯语广播也对海湾国家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伊朗的鼓动下，海湾各国伊斯兰激进组织在本国积极开展反政府活动，试图建立伊朗模式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输出革命的政策遭到了中东地区各国的一致反对和坚决抵制，这一政策的推行构成两伊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海湾国家在战争中多采取了支持伊拉克的政策。两伊战争持续八年之久，伊拉克和伊朗都为此付出了沉痛代价。

由于“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外交政策的推行，因而伊朗不仅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四面树敌，而且在国际社会也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此外，由于推行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封闭和孤立处境，伊朗在经济上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并因此蒙受了严重损失。实践证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是一条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色彩，但给伊朗乃至中东地区都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三、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时期的外交调整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进入后霍梅尼时代。在哈梅内伊继任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当选伊朗总统之际，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导致世界局势和中东地区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在国际方面，冷战结束导致国家利益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地区形势变化方面，海湾战争使伊朗的宿敌伊拉克遭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采取“双重遏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的外交政策更加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其外交调整已成必然。

在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方面，伊朗尽管并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提法，但其具体政策已经作出了重大调整。拉夫桑贾尼指出，伊朗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是“尊重(他国)领土完整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社会和宗教价值”，“我们不想成为警察，伊朗既不会羞辱他的邻国，也不会使他们感到有威胁，我们应当全体合作来建设我们这个地区，波斯湾地区应该成为像家园一样的地区，像一个共同的农场”。^{[12]206}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伊朗与海湾国家、欧洲的关系都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但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仍然处于对峙状态。

第一，调整对海湾和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政策，与海湾国家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伊朗首先与伊拉克改善了关系。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但战争状态并没有完结，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两国间的许多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于伊朗政策的变化，两伊关系得到了突破性的改善，1990年，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此后，由于在国际上的处境相似，共同面临美国的威胁与制裁，两国矛盾也有所缓解。此外，伊朗也与沙特实现了和解。沙特是海湾六国的核心，也是海湾地区大国。1987年朝觐流血事件发生后，沙特与伊朗于1988年中断了外交关系。自1990年10月两国外长在纽约会晤以后，两国于1991年3月26日恢复了外交关系。伊朗与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关系也得以改善。在1990年海湾危机中，伊朗坚持中立立场，但对科威特深表同情，海湾战争期间，伊朗政府一直与科威特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积极回报伊朗，主张在海湾地区安全体系安排中不应该排除伊朗，这一原则立场对两国恢复关系很有积极作用。1991年12月伊朗外长访问了卡塔尔、阿曼、巴林和阿联酋，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二，与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相对缓解与改善。众所周知，“拉什迪事件”是影响伊朗同西方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1989年霍梅尼去世时，伊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仍比较强硬。海湾战争后，美国力图联合欧洲一起对伊朗实施“遏制”战略。因此，为挫败美欧联合，伊朗在“拉什迪问题”上的态度逐渐松动。1995年，伊朗明确表示不再派杀手刺杀拉什迪。1996年初在经过国内激烈争论后，拉夫桑贾尼总统公开宣布，撤销杀死拉什迪的命令，从而主动排除了伊朗与欧洲关系的政治障碍。伊朗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从1989年到1993年，西方国家(主要是德国、日本、意大利、

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在伊朗的进出口总额中每年都占 40% 左右。^{[9]401}其中,德国和日本分别是伊朗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进口国和石油输出国。

第三,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仍然处于对峙状态。在老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由于美国对伊朗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指责伊朗推行国家恐怖主义、侵犯人权、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依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与美国仍有一定的接触,包括赔偿美国石油公司在伊斯兰革命期间遭受的损失、同美国两家公司签订石油购销合同等。克林顿上台后,推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石油供应和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1995年,美国政府下令禁止美国公司与伊朗签订合同进行石油开采合作,同时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制裁,中止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和投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达马托法,对在伊朗进行巨额投资(4 000万美元以上,1997年改为2 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公司实行制裁。针对美国的这一政策,伊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1996年伊朗议会通过拨款2 000万美元的议案,以对付美国众议院拨款2 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伊朗反政府势力的法案。^{[9]402}

在外交调整方面,伊朗在执行睦邻友好政策、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如伊朗对中亚穆斯林国家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积极施加影响;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继续坚持拒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反对由美国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但与过去相比较,伊朗更强调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树立伊斯兰典范来扩大影响,更注重以经济、文化、援助等和平方式参与世界事务。

四、哈梅内伊—哈塔米时期的“对话”外交

1997年5月,开明宗教人士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当选为伊朗总统;在2001年总统选举中,哈塔米再度当选。在哈塔米执政的八年间,对内推行经济与民主改革,对外通过“文明对话”缓和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伊朗内外政策的核心。在外交上,哈塔米提出了不同文明应该相互对话、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思想。他认为,文明间对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类的普遍正义和自由;文明间对话可以加深各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世界和谐,减少国际冲突,防止单一文化统治,进而形成一个包括一切文明在内的世界新文明。^{[13]57}在这一总体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哈塔米政府在改善与海湾国家关系,推进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缓和,发展与欧盟关系,松动与美国的对抗僵局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

首先,改善与中东国家关系,推进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哈塔米政府成立伊始,就派哈拉齐外长遍访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表达了伊朗新政府要与其改善和发展关系的诚意。1997年12月,伊斯兰组织首脑会议在德黑兰召开,为伊朗打破外交孤立和重返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沙特外交大臣访问伊朗,双方认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对实现地区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1999年5月,哈塔米总统对沙特和卡塔尔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改善关系、加强合作扫清了道路;1998年5月,伊朗外长哈拉齐访问阿联酋,双方同意就岛屿领土争端保持高层接触,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在与伊拉克的关系上,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并允许朝觐者到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朝觐,使两国的敌对关系有所缓解。在中东和平问题上,哈塔米政府表示伊朗虽不赞成中东和平进程,但不会对其采取破坏行动;在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关系问题上,伊朗强调其支持主要为道义支持。哈塔米政府还积极加强与中亚、里海地区国家的经济与能源合作,并力求在调节地区冲突中发挥作用。

其次,结束与欧盟的外交危机,全面改善与欧盟的关系。1997年4月,德国柏林法院指责伊朗参与了1992年在柏林发生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被杀事件,导致伊朗与欧盟各国互相召回本国大使的危机。哈塔米上台后,表示愿意与欧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改善关系。同年11月,伊朗与欧盟达成协议,欧盟各国大使纷纷返回伊朗,危机得以化解。与此同时,哈塔米政府彻底了结了与英国关系中的“拉什迪事件”。1998年,伊朗外长哈拉齐和英国外交大臣库克就拉什迪问题发表声明,伊朗表示不计划、不鼓励、不资助任何人对拉什迪采取任何危及生命的行动;库克表示对拉什迪作品伤害伊朗人民和穆斯林感情深感遗憾,英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都不宽恕拉什迪作品的内容。1999年5月,伊朗与英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继1998年意大利总理、法国外长相继访问伊朗后,哈塔米于1999—2000年相继访问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成为第一位出访西欧的伊朗元首。尽管伊朗与欧盟国家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双方关系毕竟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 长期冰冻的美伊关系出现缓和迹象。1998年新年前后, 哈塔米在讲话中多次表示, 希望与美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双方进行文化和民间交流。克林顿总统也表示希望就实质性问题同伊朗进行对话。受此影响, 美伊双方的民间交流迅速启动, 摔跤队和学者互访拉开了美伊民间外交的序幕。1999年访问意大利时, 哈塔米表示伊朗准备与美国对话。2000年9月, 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 哈塔米总统指出, 改善伊美关系的重大障碍主要在于美国单方面对伊朗实施贸易制裁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敌视政策。在此次会议上, 哈塔米提出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开展对话的主张, 他所提出的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的建议也得以实现。但是, 由于美国与伊朗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尖锐矛盾, 以及受到双方国内因素的影响, 伊朗与美国关系依然存在许多重大障碍和阻力。“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将伊朗与伊拉克、朝鲜列为“邪恶轴心”, 双方的关系再次出现倒退; 2003年伊朗核危机的升级使伊朗与美国的对抗进一步加剧。

五、哈梅内伊—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

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的内部改革与外交调整, 引起了伊朗国内务实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化与对抗。在2005年和2009年的总统选举中, 保守派势力的代表内贾德两次当选总统。内贾德执政以来, 较之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 伊朗的外交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之为“伊朗革命主义外交”, 其主要表现: 一是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冲破核不扩散机制; 二是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 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 三是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14]8}但是, 在笔者看来, 进入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并非简单地概括为“革命主义外交”, 其对外政策固然有加强伊朗与西方及以色列对抗的色彩, 但又与霍梅尼的“革命外交”有着鲜明的区别, 因为伊朗与海湾邻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仍处在持续改善之中,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并非一味执行强硬的对抗政策, 而是采取软硬兼施的多种策略。对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 笔者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观察和分析。

第一, 伊朗持续改善与周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表明伊朗并不想自我孤立, 而是试图通过发展睦邻关系, 为伊朗崛起创造地区环境与周边环境。

在2005年竞选时, 内贾德主张发展“公正的国际关系”, 表示伊朗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关系, 特别是发展与周边国家、伊斯兰国家的关系。2007年, 内贾德首次出席了在多哈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 呼吁实现“没有外来干预的地区和平与安全”。2008年6月, 伊朗外长穆塔基指出: “我们外交政策最优先考虑的, 就是与区域合作一致。”^{[15]17}2008年11月, 海合会秘书长访问伊朗时表示: “我们支持伊朗完全用于和平的核项目。”^{[16]17}伊朗与海合会展开了对话活动, 甚至提出了海合会应吸收伊朗和伊拉克的主张。为消除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核计划的忧虑, 伊朗一再保证其核计划的和平目的。伊拉克战争后, 伊朗积极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2008年3月, 内贾德实现了对伊拉克的历史性访问, 承诺为伊拉克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15]16}伊朗还积极改善同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例如对于1979年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的埃及, 内贾德于2007年表示伊朗准备与埃及恢复外交关系。此外, 伊朗还积极推进能源外交, 通过兴建天然气管道发展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内贾德执政以来, 在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关系方面, 其政策依然是其前任政策的延续。

第二, “拥核崛起”已成为伊朗国家战略的核心, 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硬对抗, 对“什叶派弧形地带”激进势力的支持, 都是这一根本目标的产物。

在伊朗“拥核崛起”这一问题上,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有学者指出伊朗核计划的最高目标是“拥有核武器, 实现强国梦”, 最低目标是“拥有核能力, 有条件弃核”。其内部动力来自于其民族与国家意志, 其外部诱因在于美国与以色列的安全压力, 以及美国在核问题默许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双重标准。^{[17]3-4}内贾德在2005年竞选时就表示, 伊朗拥有掌握和利用民用核技术的权利, 伊朗决不屈服于外来压力,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18]在伊朗核问题上, 在布什执政期间, 美国一方面通过制裁向伊朗施压, 另一方面多次扬言通过“先发打击”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并促成其国内的政权更迭。内贾德深知, 一旦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不仅其“拥核崛起”的目标难以实现, 而且将直接威胁国内稳定。因此, 伊朗采取了一条绝不在美国压力下弃核, 但也绝不关闭和谈大门的既坚定不移又不乏灵活性的核战略, 并最终等来了奥巴马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松动。为配合这一战略, 内贾德不断发表

刺激以色列的强硬言论,甚至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其战略考虑既在于引起国际社会对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的关注,同时也是博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同情支持的招牌。通过对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叙利亚等激进力量施加影响,伊朗在伊拉克重建、中东和平进程等重大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其重要图谋在于牵制美国,使美国在解决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时有求于伊朗,进而增强伊朗抗衡美国的砝码。

可见,内贾德的强硬外交对于增强伊朗的民族凝聚力,转移国内政治危机,增强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提高伊朗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伊朗与美国的严重对立、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在国际社会日趋孤立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伊朗推行“拥核崛起”战略而导致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对抗加剧,这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伊朗的强硬姿态虽然可以调动反抗西方强权的民族情绪,暂时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但并未能给伊朗创造一个宽松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并最终损害了伊朗的国家利益。^{[17]123-124} 奥巴马上台后,接触与施压构成了美国伊朗政策的主要手段,美国一方面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伊分歧,与伊朗发展“建设性关系”,暗示美国不谋求推翻伊朗政权,甚至表示“伊朗可以和平使用核能”;另一方面则不断警告伊朗如不作出改变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就奥巴马就职以来的美伊关系看,双方虽然都有改善关系的期待与善意表示,就总体而言尚未出现大的突破。如果内贾德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强硬的外交政策不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改变,美伊关系再度走向紧张对抗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并导致国家利益严重受损。

结束语

通过对 80 余年来伊朗外交的历史回顾,有两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吸取的历史教训。首先是如何避免国家的外交走向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从巴列维王朝到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两种极端的体现,巴列维王朝片面追随和依附美国的外交,使伊朗外交丧失了独立性;而霍梅尼矫枉过正的革命外交,又使伊朗陷入了空前的国际孤立。其次,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一问题突出体现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外交之中,霍梅尼时期的“输出革命”外交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严重损害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开始逐步发生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转变,但时至今日仍然无法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制约。

参考文献:

- [1]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M].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 [2]陈万里, 杨明星. 伊朗“第三国外交”战略的历史考察 [J]. 国际论坛, 2005(5).
- [3]刘强. 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一种全球多视角的分析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 [4]Mohammed Amjad. *Iran: From Royal Dictatorship to Theocracy* [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 [5]张振国. 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白色革命”研究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6]杨兴礼, 冀开, 陈俊华. 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年.
- [7]Hossein Bashiriyeh,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M]. Croom Helm London & Canberra: St. Martin's Press, 1984.
- [8]K. R. Singh, *Iran: Quest for Security* [M].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80.
- [9]王新中, 冀开运.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0]周春, 晨风, 陈友文. 当代东方政治思潮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11]陈嘉厚. 现代伊斯兰主义 [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 [12]刘月琴. 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3]蒋真. 从伊朗内外政策看哈塔米主义 [J]. 西亚非洲, 2005(3).
- [14]田文林. 伊朗革命主义外交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6(11).
- [15]汪波. 美国与伊朗构想的海湾安全秩序之争 [J]. 西亚非洲, 2009(8).
- [16]王京烈. 伊朗核问题与中东地缘政治 [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4).
- [17]杨光. 中东非洲发展报告 (2007~ 200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8]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EB/OL]. <http://news.sohu.com/20090619/n264620766.shtml>

(责任编辑 敬军)